

孔孟之間與老莊之間

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

• 李學勤 •

一九九三年清理出土的荊門郭店楚簡，在一九九八年公佈；一九九四年收購入藏的上海博物館楚簡，自二〇〇一年開始發表，迄今仍在繼續出版之中。郭店簡和上博簡的出現，迅速引起一波又一波的討論研究熱潮，涉及到許多學科和方面，但受影響最大的，恐怕應推學術史、思想史。兩批簡內大量豐富的佚籍，使人們不得不提出重寫有關學術思想歷史的要求，在二十世紀長期流行，似乎早已成為定論的若干觀點，正在遭到動搖，甚至導致根本性的改變。

這篇小文想著重考察郭店簡、上博簡發現後，學術思想史直接受其影響的段落與部分。文中將先就簡的年代本身作進一步的推定，然後分別談到這兩批簡的兩項最主要的內容，即儒家和道家，分別進行概觀的探討。由於我個人識力有限，同時上博簡也還沒有完全公開，看法只能是不成熟，或者說是暫時性的，敬希大家賜予指教。

一、郭店簡、上博簡的時代

郭店簡與上博簡時代的研究條件明顯不同。前者係經考古發掘出土，有所自墓葬的材料記錄足稽，後者出於盜掘流散，缺乏原來墓葬的信息。

如眾所周知，郭店一號墓其實也經過盜擾¹，盜墓者第一次僅挖至槨板，第二次則在槨板東南隅頭箱南端鋸洞，並且撬開邊箱，盜去一些文物。不過從後來發掘的平面圖看，所失不多，特別是簡基本得以倖免。這就使墓以及簡的時代有可能得到推定。

按照考古學的原則，郭店一號墓的時代是墓中簡的時代的下限。作為墓的隨葬品的簡，其書寫的時間不可能遲於墓的下葬，由於是實用的書籍，一般說總應比墓的建成為早。至於這些書籍的著作時間，還可能比簡的書寫早相當一段時期，是大家不難理解的。

郭店一號墓的發掘簡報，業已對墓的時代做了很好的分析。這座墓位於楚國郢都地區，這個地區的墓葬，考古學者已經有比較詳細可靠的分期，其中江陵雨台山墓葬群的序列可以做為最好的標尺²。郭店一號墓的簡報正是這樣做的，以所出器物盡可能同雨台山類似出土品對比。下面將比對結果表列出來，前面是郭店一號墓所出器物名稱，後面是雨台山出土同型器物的墓號及所屬分期：

銅器：	郭店：	雨台山：
盤	M354，	四期
扁菱形鏃	M499，	四期
馬銜	M323，	四期
蓋弓帽	M545，	四期

陶器：		
鼎	M176、M179，	六期
盃		六期Ⅳ式
斗		六期Ⅱ式

漆木器：

¹ 湖北省荆門市博物館：〈荆門郭店一號楚墓〉，《文物》1997年第7期。以下有關該墓材料均據此文。

²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：《江陵雨台山楚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4年。

耳杯	M245，	五期
木梳	M513，	五期
木篋	M314，	四期

這裏面陶盃、陶斗，簡報對比兩台山六期，需要說明一下。兩台山分期中的陶盃，Ⅲ式與Ⅳ式實際非常接近，據報告，見於M176、179的Ⅲ式盃「環耳外撇近橫，蹄足內側平，外側有削割痕跡，肩、腹部飾弦紋」，而見於M555的Ⅳ式，「形制相同」，只說「環耳外侈近橫，腹壁直，圈底近平，蹄足內側平，外側呈三棱形」³，同Ⅲ式的差異非常細微。郭店的盃，看線圖與兩台山Ⅲ、Ⅳ兩式均有一點差異，可能是由於足上部有獸面，畫到Ⅳ式一邊去了。我認為該盃也當對比兩台山Ⅲ式，在其五期，這和陶鼎恰相配合，已見於兩台山M176、179。另外陶斗，郭店的一件與兩台山Ⅰ式、Ⅱ式差別都比較大，恐沒有分期的意義。

把陶器中的盃改到兩台山五期，去掉斗，便可看出郭店一號墓整體說來相當兩台山五期，即戰國中期後段。

簡報又專門以郭店一號墓器物同距離很近的包山二號墓對比，同型的有銅扁菱形鏃、害轄、木枕等。尤其是方形有漆繪的銅鏡⁴，兩墓所出「如出一範」。這種鏡不是耐用物品，更表明墓的時代性。包山二號墓的時代可由墓中簡文紀年推定，是公元前三一六年⁵，屬於戰國中期後段，用兩台山分期，也在五期。

這一切，證明簡報講郭店一號墓「具有戰國中期偏晚的特點」確是很對的。

戰國中期後段，從絕對年代來說意味着什麼呢？仍以兩台山分期來看，在中期後段之下，還有楚墓的一個期，即戰國晚期前段的六期。郢都楚墓的下限，公認在秦白起拔郢的公元前二七八年，此後當地的墓即歸秦墓的範圍⁶。作為考

³ 同2，第68-69頁。

⁴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：《包山楚墓》，第194頁，文物出版社，1991年。

⁵ 同4，第332頁。參看李學勤：〈包山楚簡卣即巴國說〉，《中國文化》第21期，2004年。

⁶ 郭德維：《楚系墓葬研究》，第162頁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5年。

古器物的分期，能明顯成為一個期總要占二三十年甚至多一些，而公元前二七八年上距公元前三〇〇年不過二十二年，所以我們說郭店一號墓不晚於公元前三〇〇年，應該是合適的。有的學者出於學術思想史研究的考慮，希望把墓的時代下移，是做不到的。

上博簡無法用像郭店簡這樣的方法來推定時代，但如學者們共同感覺到的，上博簡的形制、字體等與郭店簡沒有突出差別，當屬於同一較寬的時代範圍之內。以下兩點，似可作為推測時代的參考：

上博簡有一種現題為《柬大王泊旱》⁷，「柬大王」即楚簡王，卒於公元前四〇八年。上博簡包括這個王諡，自然不能更早。簡王的軼事成為一種文獻流傳，可能要在其身後若干年，把簡的整體年代估計在戰國中期後段以下較為合理。

與這批簡同時，有一些絲織品流散，傳說出於一墓。其刺繡技法紋飾都和江陵馬山一號墓的出土品相若，很可能屬於同時，馬山一號墓的時代，發掘報告云「為戰國中期偏晚或戰國晚期偏早，約公元前三四〇年之後，至公元前二七八年」⁸。

因此，我們試估計上博簡所自出的墓時代為戰國中期偏晚到晚期偏早，簡的書寫時代也不出此限。

二、孔孟之間

郭店簡依整理者的劃分，有書十六種。上博簡（不包括另收的字書等簡）尚在陸續發佈，據稱至少有書八十多種。兩者相加，已超過百種，應該說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其時在楚都傳流的書籍的主要趨勢。

⁷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（四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。

⁸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：《江陵馬山一號楚墓》，第94-95頁，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。

兩批簡，內容固然很多很雜，但主要的，有學術思想意義的部分，是屬於儒家和道家。我們看郭店簡裏面的四種《語叢》，性質是多種書籍的摘抄，其內涵主要仍為儒道兩家。這說明，當時在楚國的諸子百家學說，這兩家實居優勢。進一步設想，由於楚國並非學術的中心，這樣的優勢狀況可能也同樣存在於全國其他多數地區。今後有條件的話，試以公元前三〇〇年為軸線，對學術思想史作一考察描述，一定是很有興趣的。

簡中所見儒、道兩家著作，都出於學者的傳述。儒家作品有記述孔子言行的，如《詩論》、《孔子閒居》，均係弟子記錄傳習之作。道家作品只有《老子》係老子手著，但所見是摘錄本⁹，所附《太一生水》則顯為後學增加。因此，我們根據這兩批簡所能夠直接闡發的，是老子、孔子以下早期儒家的學術思想。

現在先看儒家。

我曾一再引用錢穆先生《先秦諸子繫年》關於儒門諸子生卒年代的估算，下面再按本文的需要開列一些：

孔子	公元前五五一～四七九年
子夏	五〇七～四二〇年
子游	五〇六～四四五年
曾子	五〇五～四三六年
子思	四八三～四〇二年
子上	四二九～三八三年
孟子	三九〇～三〇五年

孔子為儒家第一代。為七十子中後進的游、夏、曾子，是孔學的主要承繼人，是第二代。子思則與七十子弟子平列，是第三代。孟子之學上承子思，然其生年不及見，或說是子思之子子上的弟子，是可能的，子上為第四代，孟子

⁹ 李學勤：〈論郭店簡《老子》非《老子》本貌〉，《紀念林劍鳴教授史學論文集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2年。

則在第五代。

郭店一號墓下葬不晚於公元前三〇〇年，與孟子卒年接近，所以我曾說郭店簡儒書當為孟子所能讀。上博簡的下限可能更遲一些，但其中儒書的內涵，寫作年代在公元前三〇〇年以下的，即使存在也一定甚少，大體說同樣應在孔孟的年代之間。《韓非子·顯學篇》云：「孔墨之後，儒分為八，墨離為三，取舍相反不同，而皆自謂真孔墨。」關於儒分為八，篇中說：「自孔子之死也，有子張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顏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（或作梁）氏之儒，有孫氏之儒，有樂正氏之儒。」儒分為八並不是並世的八個支派，而是輩份不同的八位學者，各有趨向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儒分為八中的一部分互相聯繫密切。前人已經論及，《孟子》書中明引曾子者九處，引子思者六處，均為崇敬推尚的態度¹⁰。樂正氏當指曾子弟子樂正子春，梁啟超已有說明，即使如郭沫若說是孟子弟子樂正克，也同屬一系¹¹。仲良子有注釋曾子之語，同樣和曾子系統有關¹²。這樣看來，儒分為八中的一半實際彼此相關，可說是當時儒家的主流。

郭店簡以及上博簡的發現，正好凸顯了這一點。我已經討論過，郭店簡《緇衣》、《五行》出自子思¹³，其他《性自命出》等也與曾子、子思一系有關係，甚至不妨視為《子思子》¹⁴。上博簡也有《緇衣》和《性自命出》（《性情論》），證明這一系儒家的著作在那時非常流行，有很大影響。

《性自命出》郭店簡有一段子游的話¹⁵，特別值得注意。《荀子·非十二子篇》在指責子思、孟子的「五行」說時，講到其說托始於子游¹⁶，可見子游

¹⁰ 侯外廬主編：《中國思想通史》，第一卷，第363頁，人民出版社，1957年。

¹¹ 陳奇猷：《韓非子新校注》，第1127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。

¹² 同11，第1126-1127頁。參看李學勤：《周易經傳溯源》，第88-89頁，長春出版社，1992年。

¹³ 《五行》也見於馬王堆帛書。

¹⁴ 李學勤：《重寫學術史》，第7-11頁、第104-107頁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。

¹⁵ 彭林：〈郭店楚簡《性自命出》補釋〉，《中國哲學》第二十輯，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。

¹⁶ 《郭沫若全集》歷史編2，第132頁，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。

同這一系存在一定聯繫。

最近讀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梁濤先生的文章《戰國時期的禪讓思潮與『大同』『小康』說——兼論〈禮運〉的筆者與年代》¹⁷，文中提到《禮記》的《禮運篇》作於子游之說。《禮運》的中心內容是禪讓，而郭店簡的《唐虞之道》，上博簡的《容成氏》、《子羔》等都主張禪讓，其間應有關聯。梁文指出這一點，是非常正確的，但以為《禮運》成於公元前三一六年燕王噲讓國以後，則恐不妥當。

禪讓之說本於《尚書·堯典》，起源應該很早，但在儒家學說中形成高潮，可能即始於子游或其弟子撰作的《禮運》，《唐虞之道》等是在其影響下引申發揮的產物。到燕國的事件發生之後，孟子率先起而反對，鼓吹禪讓的風氣便煞住了。兩批簡的儒家著作中，禪讓說一時盛行，正與戰國中期後段公元前三一六年以前的形勢相當。這對於推斷簡的時代，也是有價值的論據。

總之，在孔孟之間，曾子及子思一系作用最大，宋儒的道統說還是有相當道理的。

三、老莊之間

相比於儒家的孔孟之間，道家的老莊之間的傳承更不清楚。

由於《史記》關於老子的傳記突出了所謂「猶龍」的特點，老子其人和他的時代長期是爭論的焦點問題。郭店簡本《老子》的存在，至少把《老子》成書在《莊子》之後的一派說法排除了。

根據錢穆《先秦諸子繫年》，莊子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三六五～二九〇年，所以郭店、上博簡中各種書籍也都為其所能見。

¹⁷ 梁濤：〈戰國時期的禪讓思潮與『大同』『小康』說——兼論《禮運》的筆者與年代〉，《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》第四輯，2004年。

《老子》的形成，應比兩批簡的時代要早，這是因為下列幾點理由：

首先，郭店簡裏的《老子》三組，只是《老子》一書的摘抄本。這有其內證，《老子》丙組附有《太一生水》，而《太一生水》乃道家後學所作，其文字所本的《老子》篇章，有的不見於郭店簡，充分說明當時《老子》絕不限於簡本的那麼多¹⁸。摘抄本自然要晚於內容更多的原本。

簡中還有一些作品，是引申推演《老子》的，例如《恒先》。《恒先》不僅襲用《老子》，而且在思想上有相當大的跨進。這表示《老子》比簡早，而且要早相當大的時段。

我們還可以把馬王堆帛書中的《黃帝書》放在一起考察。《黃帝書》作於先秦，不少學者都認為應屬戰國中期¹⁹，其內容多本《老子》，看來《老子》成書更應早些。我曾從各方面材料考慮，認為《老子》其書「不晚於戰國早期」²⁰。

在《黃帝書》公佈以後，學術界為「黃老之學」面貌的揭示而振奮。原來文獻豔稱得「黃老之學」，其思想富於積極色彩，與莊列一派的引退截然有別。後來的若干法家人物，都曾於此取義，如慎到、申不害以至韓非之流，殊不足怪，而其最晚的作品是久被貶為偽書的《鶡冠子》。

黃老一派道家的重新認識，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成果，然而這是老子下面道家的別派，對於老莊之間的連繫尚未能說明。

釋讀上博簡《恒先》，使我們看到這裏缺失的鏈環。

《莊子·天下篇》於諸子均有批評，最後推尚老聃、關尹，而歸結於莊周。文中說關尹、老聃「建之以常無有，主之以太一」，實則這樣的範疇並未見於《老子》書內。郭店簡《太一生水》有「太一」，我曾以為是關尹遺說²¹。

¹⁸ 同 9。

¹⁹ 唐蘭：〈馬王堆出土《老子》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〉，《考古學報》1975 年第 1 期；龍晦：〈馬王堆出土《老子》乙本前古佚書探原〉，《考古學報》1975 年第 2 期。

²⁰ 李學勤：《古文獻叢論》，第 140 頁，上海遠東出版社，1996 年。

²¹ 同 14，第 28-32 頁。

《恒先》開頭便說：「恒先無有」，這恰恰就是《天下》講的「建之以常無有」²²，其為老子弟子關尹一系的遺說，是明顯的。

《恒先》下面還有一串術語，我讀之為「大全」、「大（太）清」和「大（太）虛」。三者均見於《莊子》書內，「大全」見《田子方》，「太清」見《天運》，「太虛」見《知北遊》²³。可以清楚地看到，《恒先》是《老子》到莊學之間的聯絡橋樑。

希望本文的簡短討論，能促使更多學者注意孔孟、老莊之間學術思想演變的探討。相信這方面研究不但會更進一步發現已發現簡文的秘蘊，還將導致對有關傳世文獻有深入的認識，在不久的將來，再有新材料出現，我們可以有較充分的準備。

²² 李學勤：〈楚簡《恒先》首章釋義〉，《中國哲學史》2003年第3期。

²³ 同 22。

